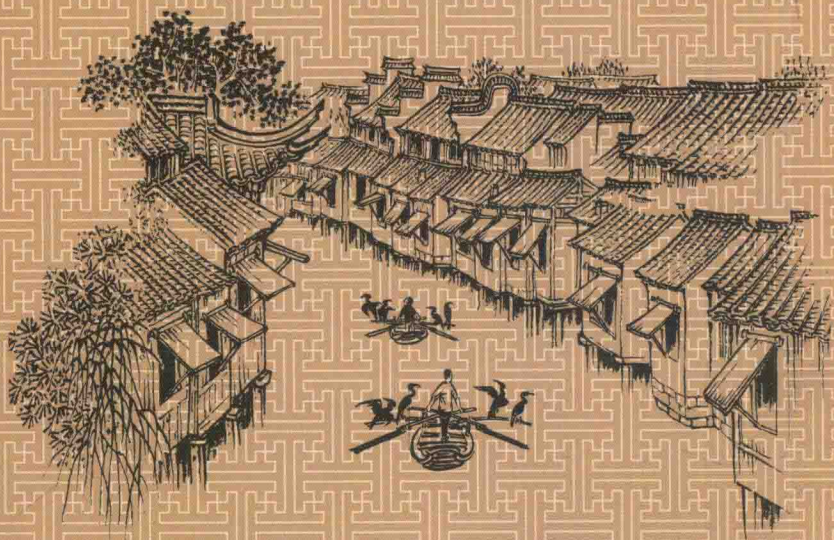




邵峰
编著

天上村前
与
胡氏三杰

上海三联书店



邵峰
编著

天上村前
与
胡氏三杰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胡氏三杰与天上村前/郜峰编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3. 11

ISBN 978 - 7 - 5426 - 4429 - 9

I. ①胡… II. ①郜… III. ①胡敦复(1886~1978)-人物研
②胡明复(1891~1927)-人物研究③胡刚复(1892~1966)-人物研究
④教育史-无锡市 IV. ①K826. 11 ②G527. 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53048 号

胡氏三杰与天上村前

著 者 / 郜 峰

责任编辑 / 叶 庆

装帧设计 / 上海玄廊广告有限公司

监 制 / 李 敏

责任校对 / 张思珍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http://www.sjpc1932.com>

印 刷 / 南京新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 mm×1168 mm 1/32

字 数 / 184 千字

印 张 / 7.125

书 号 / ISBN 978 - 7 - 5426 - 4429 - 9/G. 1196

定 价 / 29.00 元

自序

preface

回望名师大家灿若星河的二十世纪，中国科教史上的“胡氏三杰”——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无疑不可忽略。大哥胡敦复，中国（民国以来）第一所私立大学——大同学院（大学）的首任校长、“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章士钊语）。胡明复，现代中国第一位数学博士、中国科学社创始人。胡刚复，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人，被誉为“我国第一个把现代实验物理引进中国高等学校的教授”、“我国核物理科学的一代宗师”（杨竹亭语）。

在实施“科教兴国”方略、重圆“中国梦”的今天，我们提起他们，会有一种携手同行的感觉。同样面临社会转型，同样高举“爱国”、“科学”大旗，同样追寻美好的梦想（大同梦与中国梦），在回望来路之际，有了前辈的这种“携手”，我们有了底气。这种跨越时空的“携手”告诉人们一个道理：前人开创的事业，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曲折，出现了断层和疏隔，但并不等于前人的毕生追求一无价值，相反后继者在接过他们手中接力棒的同时，体会到了他们未竟事业的方兴未艾。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执政理念上来说，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当前，人们如果能深入了解一下“科学”的含义、了解一下“科学发展”的历史，包括阅读一些科学家的传记、文章，不会是一件多余的事，“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作为文字工作者来讲，抽一点时间，写一点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对于科普工作的推进，特别是对于

青少年的教育,无疑同样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本人之所以愿意担当此书的编撰任务,也是基于这个原因。

探索“胡氏三杰”的科学、教育之旅,无疑应该从他们的故里着笔。众所周知,无锡是一个鱼米之乡,现代以来因经济发展迅速,更拥有了“小上海”的美誉。无锡是“长江三角洲有代表性的纯粹工商业资本最发达的地区,不像当时的沪、津、穗,仅有外国的资本侵入”(秦柳方语)。注重研究无锡历史,包括研究无锡地区的教育历史,对于了解中国发展的走向所具有的价值,早就为学界所共识。无锡学者王赓唐在《辛亥革命前无锡社会的变迁》一文中写道:“截至辛亥革命前夜,无锡教育制度的改革是有成绩的,影响也是深远的。辛亥革命前夕宣统元年(1909),据地方志统计,锡金两县有人口 798 286 人。拥有 152 所各类学校,平均 5 200 多人就有一所学校,这个比率在当时不能算低。无锡不愧为历史上文化教育素称发达的地区。”他还说:“清末‘新政’十年之中的教育改革,促进了无锡文化环境的改变,十年之后的辛亥革命,无锡成为沪宁线首先爆发的城市,是由历史孕育而成的。”(《辛亥革命与无锡》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第 46 页。)
“胡氏三杰”正是在这十年“黄金时间段”中崛起的三位富有代表性的教育家、科学家。

“胡氏三杰”诞生在一个教育世家,他们的祖辈、父辈们创办新学的历程在历史上是一个亮点。“光绪二十八年(1902),胡壹修、胡雨人在堰桥村前村创办的胡氏公立蒙学堂,设男女两部,锡地学校始有女生部。”“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无锡新学初兴,胡和梅及其子胡壹修、胡雨人兄弟,在天上市尤家坦设师范传习所;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又在家乡堰桥同善局内设师范传习所,为新学培养师资。这是无锡地区师范教育之始。”(《太湖教育史》第 101 页)【1】

《江南乡村社会的现代转型——基于陈翰笙无锡调查的研究》(以下引用简称《江南研究》)一书写道:“对包括陈翰笙在内的无锡现代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是无锡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无锡的文化沃土上产生了经济学家陈翰笙、薛暮桥、孙冶方;实业家薛

福成、荣氏兄弟、周舜卿；文学家钱穆、钱钟书；科学家徐寿、华蘅芳等等，他们影响远远超出了无锡区域，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研究，……”（第56页）【2】“胡氏三杰”也是如此，他们非但是无锡的，也是中国的，也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解俊民说：“胡刚复先生是我国现代一位极有贡献的物理学家，无论对世界的还是中国的物理学发展都可如此说。”【3】胡明复也如此，他的博士论文被发表在美国的一流数学杂志上，引起了国际数学界的广泛注目，被现代数学史视为“中国现代数学真正开始的标志。”胡敦复晚年留居美国，接受了媒体采访，谈论了大同大学创办的经验等。这些例子都证明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具有世界性。因此，对于“胡氏三杰”开展研究，无疑也是一个国际性的大课题，理应作为一个极富典型意义的学术性个案受到学界重视。

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籍学者陈翰笙、孙冶方、薛暮桥、秦柳方等人就展开了一场著名的无锡乡村调查，被学界高度评价：“陈翰笙领导的无锡调查是清末民国在我国知识界兴起的社会调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了范本和史料，展现了转型中的江南乡村社会的实态。”（《江南研究》绪言）【2】，事实上，前面已说及，因无锡是“纯粹中国工商业最发达的一个地方”之故，对无锡的研究，一直是社会、历史学者关注的热门话题，但对无锡乡村的关注，似乎相对较弱，诚如《江南研究》作者汪效驷所说的：“不难发现，无锡现代史研究的重点在于经济、在于城市，对乡村、对农民的关注远远不够；探讨这一地区在现代工商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乡村社会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江南研究》绪论第57页）【2】？

“胡氏三杰”的故里在过去是一个典型的农村地区，只是近十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迅速推进，它才纳入“城市”（正确地说应该是“新城”）。毫无疑问，在不远的将来，它也将经过重新规划融入城市。但是对“胡氏三杰”的研究，必须纳入当时的历史语境，否则就违背了人文历史研究的规律。任何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当时的社

会现实和历史条件。

笔者认为城市建设与历史研究、文化保护本来就不是矛盾的，如果执政当局在城市建设重新规划的时候，在项目引进、新农村建设等方方面面，把目光放远，注重于村落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从更高层面上来提升城市化的品位，那自然也是笔者所希望的。但有必要说明的是，此和笔者所著的这本书没有关联。换句话说，如果将来这个村子果真不存在了，笔者的这本书还是要写的，这只是个人的兴趣而已。

2013年4月5日

目 录

自序 / 1

故里(上) / 1

故里(下) / 27

自立立人 自达达人 / 43

大事记 / 68

家族年谱 / 76

“胡氏三杰”资料辑录 / 173

主要参考文献 / 215

农 耕 晚 唱

一叶轻舟打桨迎，微风习习水盈盈。
牵衣笑指前途近，联袂欣沿两岸行。
茅舍竹篱初建筑，鸡鸣犬吠渐成村。
种将瓜果甘尤美，采得萍花色更清。
地阔天空新世界，山回水抱旧居氓。
二三知己能皆隐，愿结茅庐事偶耕。

(周辉《横排圩》诗一首，《晚香集》)[4]

诗里描绘的就是“胡氏三杰”的故里村前村。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这里还是一片农耕景象，虽然气息上有些凋败，但让人还能感受到一种陶渊明式的田园诗意。周辉这首诗写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二十年代，折射出当时胡壹修、胡雨人修治横排圩后的愉悦心境。

“胡氏三杰”的父亲胡壹修一世务农，他在花甲之年自曰：“我亦行年六十载，陶渔耕稼犹乡人。”胡敦复对此解释道：“先严所垦田中有鱼池，又尝兴办陶业，故云。”又云：“吾乡风俗淳厚，虽有交通之便，未染都市之化。先严以勤俭身为表率，一乡之士从之，而便辟邪侈者敛迹，其有裨于世道人心多矣。”(《胡壹修先

胡氏三杰与天上村前

生行述》)[5]胡敦复在这篇记载父亲的行述中,认为村前村是个典型的农村,父辈们以仁义施惠乡邻,乐于躬耕。后来,父亲和仲叔办的胡氏公学,其经费来源也主要靠的是义田,后面将详细述及。

无锡的大米天下闻名,村前村所在的锡北堰桥地区就是江南的主要产粮区。根据汪效驷的《江南研究》一书可知,解放前无锡地区粮田的耕作状况比较分散,四乡的情况并不均匀,拥有大面积粮田的地区就包括堰桥。“工业发达的无锡,该县东部,农村人口以佃农为多,南部农民大多数为小自耕农,每家耕地,鲜有超过二十亩者。在该县之西部及北部,颇有大农田。”“薛典镇第三保、堰桥乡二个村和北延镇十保等三地区,占人口 5.30%至 11.95%的地主阶级占有土地总数的 67.92%至 86.79%,而占人口 63.52%至 82.20%的中农贫农,仅占有土地总数的 9.08%至 24.37%”(原载于陈翰笙:《现代中国的土地问题》第 56 页/《江南研究》第 100 页)[2],胡敦复也说:“吾乡遍地农田,政府重征赋税而委水利于天命。”(《胡壹修先生行述》)[5]“1917 年胡雨人与胡壹修还在锡澄运河与锡北运河交汇处,集水面 3 600 亩筑堤,围成横排圩。……经胡和梅、胡壹修、胡雨人父子两代人精心开垦和治理的横排圩,围圩 3 600 亩,历时 40 年余年,至 1920 年初步建成了小圩区,完成筑堤、浚河、建闸、造田工程,当时已兼备挡洪、除涝、引蓄、灌注、积肥、种养等多种功能,逐步招引了无地农民参与圩耕得益。”(沈正奇:《堰桥横排圩的治理》)[6]

堰桥地区为无锡的主要产粮区之一,其丰饶从当时的《锡报》报道也可窥其一斑:“天上市乡人之操贩运稻米生涯者,约计有百数十户,此次均放舟往南路购买糯稻,日来纷纷开碇,装往上海出售,约计有四千余担之多,而沪地以各处到货拥挤,市价渐形看低,据云白糯米仅九元左右,故多数不欲脱售,须待价而沽云。”(民国九年八月十七日《锡报》“天上市米船商状况”)直至二十世纪末,堰桥地区仍为锡山市的主要产粮区之一,1991 年堰桥镇上交的粮食

总产为1600万公斤，八年上交国家商品粮3000万公斤。《无锡县志》卷二乡镇（第109页）记载：堰桥乡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全乡有耕地26772亩，以种植稻麦为主。1985年粮食总产14161.75吨，农业产值569万元，副业产值428万元。[21]

堰桥地区的蚕桑业也十分兴旺，“距今六、七十年（即清末民初时）前，无锡堰桥地区的蚕茧，曾名噪一时。本县南门及邻近各地一带的农民，都要特地来西高山一带购买蚕种……，西高山一带所产茧子，色泽白、茧层厚、出丝率高、抗病毒性强，茧价又高于其它各地。……这时的农家孩子，也是最快乐的日子，因为在养蚕上簇期间，大人顾得了蚕宝宝，顾不了小宝宝。白天饿了乏人照料，夜间睡了任蚊子叮咬。现在茧子出售了，得了钱，开心了，孩子见大人回来，本来要采桑子作水果饼果腹，现在可要向大人讨枇杷、香脆饼和海棠糕等。因为大人在蚕期内，在忙得无法照顾孩子们时，往往许愿给他们，等至卖出了茧子，买枇杷、香脆饼、海棠糕给你们吃。……刘巷为例，七八十年前……村村养蚕，发展到家家养蚕，并将荒冈植桑发展到将水田改为桑田，特别在村庄四面，近旁遍植桑园，使蚕桑事业发展到了高潮。”（刘荣福、杨琴芬老人口述/《清末民初堰桥的育蚕制种》/刘备康撰）[6]

年近九旬的村前老人胡琛老先生在《美丽可爱的家乡》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八十年前的村前村的：

笔者的家乡是无锡县堰桥镇村前村，这是一个在全县范围内少有的大村，绿水青山环绕，环境优美。村中（不含现在的旺房村）共有近300户人家，胡姓系村中的大族，80%的村民都是胡姓。此外尚有范、张、曹、谢、华等姓，但总人数很少。由于村庄太大，所以全村分成东、中、西三段，分别称为东段、中段和西段。相对来说，笔者家所在的东段的地域较小，人数也较少。

全村的南边是一条大河，称为横河，河面很宽，河水清澈。

自东向西均匀分布着四条河浜，河水同样清澈，用于饮食和洗涤是很安全的。这四条河浜连同最东边的堰桥港把家乡分成四个半岛，这样的自然环境在其它的村落中似乎并不多见。

笔者老家所在的村前东段是四个半岛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原因是聚居在这里的人们的文化程度最高，经济实力也最强，是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无锡县的一个缩影。……除了人文荟萃以外，自然环境也堪称一流。家门前是一片砖场，砖场以南则是菜畦和两排参天大树，空气异常新鲜。半岛除村庄外，其余均为良田，可谓哟哟原隰。良田主要是稻田，也有少量桑田，整个田区称之为“荣公岸”，由于田区靠近村庄，施肥管理都非常方便，农作物的产量很高，所以“荣公岸”中的田亩会受到当地村民的青睐。[7]

这里写的“哟哟原隰”是当年胡氏公学的校歌里的四个字，校歌这样写的：“哟哟原隰胶山麓，曾孙居之勤与读。于斯歌兮，于斯聚族，天生蒸民浑然璞。不有大匠伊谁琢，挺生先觉启后觉。”（《无锡县教育志》第365页）当年的校训：“诚勤”两字，胡氏子弟们就是在这稻浪滚滚、碧水漾漾的西高山麓的村子里诚勤地念书。

村前村原来是堰桥镇的一部分，一直到近二、三年才划归惠山经济开发区长安街道管辖。显然，有关村前村的历史，还得从堰桥说起。

堰桥镇（有段时间称为“乡”）位于锡澄两县的交界处，是名副其实的锡北大门，与江阴市区域仅一河之隔。从字面上看，堰桥依附于水。这个方域为太湖地区的冲积平原，地名都与水有关，如前洲、西漳、漩溪（长安桥的古称）、塘头、蓉湖、筑塘等等。过去这一带是无锡地区第二大湖泊芙蓉湖的圩区，被名之为“无锡锅底”，也是有名的桥乡、船乡。对这个区域的百姓来说，水利实为生存之命脉。

堰桥的历史可追溯到泰伯奔吴之前，泰伯建都锡东梅里后，吴

姓及其姬姓的子民就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其中有一支迁移到了堰桥附近的新塘里，“新塘，心膛，大地的心膛”，说明新塘里的地理位置很好。这个村落居住人口大部分姓吴，清朝时建有“三让堂”（二百多年历史），与锡东的祖殿“泰伯庙”，锡西惠山脚下的“泰伯殿”遥相呼应。东汉末、三国初，高士高彪的儿子高岱举族从遥远的鲁地迁至吴地，隐居于西高山北麓，后葬于此，因此西高山得名高山。高山西侧地势低洼，筑堰名为“高鲁堰”。三国时期，孙权与曹魏抗衡，置毗陵典校尉，把大量移民（现在可称之为建设兵团）迁移到堰桥以东的高岗地区，屯田耕作，人口聚居，形成村落。而堰桥以北以西还是一片泽国。《无锡县志·大事记》记载：“吴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迁都建业。无锡为吴国地。吴嘉禾三年（234年）省无锡县，分吴郡无锡以西为屯田，置毗陵典农校尉。吴赤乌八年（245年）典农校尉陈勋导长广溪。”[21]

三国时期，孙权的母亲吴国太在西高山建诵经堂，后人扩建为崇庆庵，这是无锡最早的佛教寺院，北宋全盛时有宇殿僧舍5048间，屡建屡毁，至明代重修。堰桥地区的宗教信仰除了佛教外，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及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也都历史悠久，故而寺庙庵堂众多，信徒广泛，各种宗教活动频繁。西高山“三月三”的迎神庙会，远近闻名，规模盛大，成为方圆一百零八村宗教活动之首。

自五代末期以来，胡姓子弟有多支往江浙迁延，其中以宋安定先生胡瑗为始祖的如皋胡氏，最为兴旺发达。安定胡氏名闻天下，后世的胡氏子孙往往归宗于他，成为最庞大的一支。如皋胡氏因安定先生胡瑗声名鹊起，涌现出大量人才。安定公有三个儿子，都为显臣。长子胡志康登进士第，担任迪功郎、台州文学，后官至杭州观察推官；次子胡志宁担任永州知州；三子胡志正授职迪功郎。如皋胡姓后代分为杭州、永州、如皋三派。三子胡志正奉送安定先生遗留下来的衣冠，从湖州重回如皋，归葬故里，以此形成如皋派。胡志正有两个儿子：胡守经、胡守权。胡守经子孙在如皋繁衍，成为如皋望族。胡守权则因喜爱读书、被世人尊称为达庵公。（《中

胡氏三杰与天上村前

华姓氏谱·胡姓卷》第69页)[23]

据当地的史书记载,公元1096年(宋哲宗绍圣三年)胡守权渡江游学晋陵(今常州一带)、无锡之间。风土淳厚的无锡,使他驻足忘返,于是栖居于同窗好友陈敏的家中。陈敏,北宋书画家,字伯修。无锡人,熙宁三年进士,胡瑗高徒,被胡瑗称之为:“锡之英也。”自号濯缨居士,斥司马光为奸党。工书画,风格清瘦。(见《梁溪书画征》)。达庵公落脚兴宁乡新塘里后,埋头于书山之中,繁衍子孙,休养生息。九百多年以来,胡氏后裔们秉承祖上“唐宋遗韵”的家范,读书尚礼,惠福于民,逐成锡北望族。

村前村版《胡氏宗谱》上有一张《村前义庄义塾图》,一处建筑物的匾额上有“两斋遗范”四个字。所谓“两斋”就是指的胡瑗首创的“分斋教学法”。“分斋教学法”的主要做法是:设立经义斋和治事斋,创行分斋教学制度。经义斋主修六经经义,属“明体”之学,培养高级经济人才;治事斋分“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属“达用”之学,培养专业人才。学生可以主修一科,兼学一个或几个副科。这一方法,是中国教育史上,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此外,胡瑗还倡导并实行了“游历教学法”、“商讨教学法”等首创的教学方法。胡子文化就是通过办学这一形式,传给了一代又一代。

据《文明梦——记第一批庚款留美生》一书分析,庚款第一批中有三个群体,胡刚复、梅贻琦等人属第三个群体“五湖四海派”,这一派人旧学基础好,但旧学并没有成为他们的包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人生似乎反而得益于从小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这一群体似乎更能紧跟时代,事业常青树的比例远高过第一、第二群体。第三群体儒家思想中的那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和“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精神以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观似乎体现得更为充分。(第89页)[8]

我们在村前村找到了同样的印证。胡文昭公第廿九世孙胡简斋曾这样著文自述家世:“高祖以勤俭起家,馆课之余,旁治生产,

家业由是日隆，及身置产满千亩，……故先生昆弟三人析产时，尚各名田九十余亩。”[13]对于子孙所恪守的祖训，他写道：“祖先宜时祭，国课宜早完，馆课宜坐定，家用宜预算，钱米宜经营，身家宜自主，胥过宜补救，以昭示来兹，不愆不忘，胡氏其昌乎。”胡简斋先生总结胡氏子弟的行为准则，是“于利禄之途，则冲澹不竞，务农课子，外无余事。韩非子云，自营为私，背私为公，盖先生虽笃于自营，而财不苟，殆能以一人之至私而成天下之至公者也。”[13]由此可见晚清时期，胡氏的家训对教育子女仍在起重要的作用。

现代前夜

赵永良的《辛亥革命前后到“七七”事变期间无锡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写道：“资本主义发展在农村引起的最大变化，是新兴工商业城镇的兴起。辛亥革命后，新城镇的兴起，犹如雨后春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无锡县40个公社（镇）和郊区人民公社所在地，绝大多数是在那时兴起的。如周新镇、荣巷、堰桥、梅村等。……堰桥商业兴盛，交通便利，镇西王源吉冶坊，年产铁锅十万多只，远销大江南北，妇女以摇袜为重要手工业，镇上有文正书院，镇西村前有胡氏公学，全国著名的数理学家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三兄弟就是这里人。”[8]。的确如此，民国前后，堰桥镇发展得很快，成了锡北地区的交通、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但是堰桥街镇的繁荣还得追溯得更远一点。

明清时期的堰桥街镇就很热闹了，据当地文献记载，徐霞客是堰桥的常客，张居正、祝枝山等名家也曾到过堰桥街镇，留下了墨迹和故事。堰桥镇上的大姓范氏，系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后代，明代迁至堰桥，镇上建有范家祠堂；堰桥大姓还有顾姓，建有顾氏家塾。上一辈的人还记得原来的街镇是什么模样，临街房舍枕河而筑，水路相通，有人说和昆山的周庄相仿。二十一世纪初，堰桥镇填没了一条东西走向的主河道，在河道原址造起了高楼，形成了街道，而

胡氏三杰与天上村前

一条南北走向的河道至今尚存，临河建筑也保留了一部分，不过已很难见到百年以上的建筑了。堰桥镇上的黄雀为锡北名产，“清朝时就已有捕捉烹煮的，有清炖、锅煮两种，色香味各具特点。还有一种味道更鲜美的“酿黄雀”，就是把黄雀内脏去净，填入加上佐料的猪肉糜，经过烧煮，更是受人欢迎，黄雀成为最佳的下酒菜。现在芦荡田少了，这种鸟类已稀少，堰桥黄雀这一传统风味只能作历史的回味了。”（《本县乡镇传统风味拾零》/陆桂根撰）[6]

现代以来，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近在咫尺的锡北地区率先受到辐射。因此，早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里就出现了救恤会、同善堂、米船业公会、“咸德”号典当行等新颖的社会公益组织；办起了新式学堂，甚至还有更为先进的图书馆、钟楼等仿照西式的现代公共设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就有电灯、电话和门牌号；胡氏三杰的祖辈、父辈已开始运用“公司加农户”式的股份制合作经营。

有必要说明的是，不少资本家，他们都是乡绅出身，虽然居住在城市，但在乡下都有田产。“无锡现代工商业者的前身大都来自乡村，出自地主，如杨宗濂家族投资业勤纱厂前，拥有义田 1 000 亩；薛南溟家族投资永泰丝厂前，拥有田地 4 万亩。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对无锡县张村区的调查，‘地主在农村经营工商业者很少，资本充裕者，大多是向城市发展而兼为资本家了。’”（《江南研究》第 153 页）[2]杨宗濂、杨宗瀚兄弟、薛福成等祖籍都在锡北的西漳一带（今属堰桥街道）。薛福成的父亲登进士榜后，举家从西漳寺头迁至城中前西溪，遂成薛氏迁城中之始祖，清光绪十五年（1889 年）薛福辰病逝，薛福成为长兄料理丧葬事宜，到过老家仁村、寺头各乡省亲，薛南溟还在寺头开设了公泰隆茧行，薛寿萱贷款给陆子容，在西漳创办了无锡最早的蚕种场“三五馆”等。

堰桥这一地区在地理上紧联无锡县城，又处于“水上丝绸之路”锡澄运河、“水陆黄金通道”锡澄运河的必经要冲，南接太湖、北联长江，与之相邻的城北地区，自晚清始就是无锡的工业区，纺织业、

运输业、船业等轻工业发达，工厂、商铺林立，而近在咫尺的沪宁铁路，使其更得天独厚地受到工商经济的辐射。据胡琛老人回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村前村已经很“现代”了：

乡间公路 抗战以前的农村，一般的道路都是泥泞的乡间小路，而家乡却有两条乡间公路，宽度都在3米左右，用石子铺设，在那时已是很高档的道路了，因为除了大城市上海以外，一般城市都没有柏油路（无锡要到1951年才有了第一条柏油路，即人民路的五爱广场至人民桥中间的一小段）。乡村公路不但可通自行车和人力车，轿车也可通行。其中一条名“堰村路”，即从堰桥西街直通笔者家的后门；另一条名“孝愉路”，从堰桥西街一直通到胡氏公学。所以名“孝愉路”是因为建路的费用是胡氏公学校长杨孝愉先生的几年工资。两条公路的建成使得家乡的交通便捷了不少。而德隆望尊的杨校长由此也在乡人中具有了更高的威望。

有轿车停泊 笔者四、五岁时刚有点懂事，印象中有时后门口停有黑色的轿车，这在当时是非常稀奇的。轿车簇新锃亮，是在外地工作的胡敦复、胡明复、胡瑞祥等回老家时所用的专车。现在的各色轿车已是司空见惯了，但在七、八十年前的农村中连自行车都是稀缺物资，更不用说是小轿车了。当然，使用轿车的前提是要有公路。所好那时已有了锡澄公路以及孝愉路和堰村路两条乡间公路，才使轿车的使用和停泊成为可能。

乡电 抗战以前大约1936年底，家乡已通电了，那是常州的戚墅堰电厂送来的。通电时笔者全家还跟随先父租住在戴岐小学附近的一户农民家里，通电的具体事务是二伯父胡斗南先生代办的。到1937年暑假我们全家回到家乡时，电灯已经安装好了。那时的电仅供照明，其它的电器如电扇、电熨斗、电吹风等一概没有，更不要说空调和微波炉了。电线走的